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鄭士元編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A REVIEW OF TUN-HUANG
STUDIES IN THE PAST CENTURY

鄭 士 元 編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精裝一冊基價三〇・〇元整

編 著 者 鄭 士 元

發 行 人 高 本 釗

發 行 者 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台 北 市 雙 園 街 96 號

台 北 市 郵 政 3643 號 信 箱

登 記 證：局 版 臺 業 字 第 0649 號

郵 政 劃 撥：0 1 0 0 4 4 2 6

電 話：3060757・3088624
3088624・3415293

印 刷 者 明 弘 印 刷 品 行

電 話：3 0 1 6 7 7 1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台一版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序

自敦煌遺書而世，研治者遍寰宇，舉世號爲顯學。雖然，求之無端緒，治之無條理，則七寶樓臺，拆下不成片段，亦無以見宮室之美，百官之富矣！近年與諸生講求斯學，常歎我國瑰寶，既散佚於異邦；而研治整理者，亦彼衆而我寡。士不悅學，斯亦國之恥也。竊謂欲治斯學，必藉目錄爲途徑，以文字植根基。嘗欲糾合同道，滙編倫敦、巴黎、日本、列寧格勒、北平、臺北所藏卷子，及海內外學人敦煌著述目錄，以供學子研究參考之用。居臺數載，詔學子讀卷識字之方，爲講明敦煌寫本字體繁簡條例，意在先通卷子之文字，然後分類探求卷子之內容。使敦煌遺書所保存之資料，灌溉古今學術文化，獲滋益而增光輝。惜夫智淺力微，徒增涸短汲深之感而已。

門人鄭子士元，遭遇時艱，迫遽厲學，博習文史，綜貫流略。亦深閱海內外敦煌著述，散無友紀，旁求不易，研究爲難，乃以講習餘暇，編撰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分類索引，凡分十四類，一百八十四目；經史文辭，社會經濟之屬各以類從，既便檢尋，亦寓辨章學術流別之意。又別撰著者索引、編年索引，便利學者，益臻周密。書成，問序於余。比年以來，余往返臺港英法，迄無定居，久不與士元相見，不意其栖栖遑遑，而治學之勤如此。士元自言，所撰目錄簿籍，不過爲初學尋檢之用，意若深有所不足者。然以余觀之，雖成學之士亦不可忽也，試舉一端，以與士元相商榷。

近世治敦煌詞曲之學者，用力之勤，采獲之富，舉世無出半塘任氏之右者。所著敦煌曲校錄、敦煌曲初探、唐戲弄諸書，均爲學林所重。任氏見向覺明唐代俗講考，據北平成字九十六號敦煌卷子：「法律德榮唱紫羅鞋雨，得布伍伯捌拾尺…僧政愿清唱

緋綿綾被，得布壹佰貳拾尺，」謂唐代僧人爲人作法事以外，並亦唱一種小曲以博布施。」乃於敦煌曲初探中引向氏之說，謂唐僧唱曲得酬，「紫羅鞋兩」爲詠物曲題。並推斷唐代已有與講唱、歌舞、戲曲相對立之「清唱」。其後在所著唐戲弄中，特立從「清唱想象演唱」一節，謂「紫羅鞋兩等，均不似故事，宜爲詠物之曲，……隋唐既有女伎清歌，及僧侶清唱之名，已反映同時存在者必尚有演唱。」觀向、任二氏所說，據敦煌卷子片言，即可創發新義，誠不能不引爲快事。然張永言氏撰「關於一件唐代的唱衣歷」（見一九七五年文物第二二八期）條舉敦煌伯三四一〇號「各寺布施及僧人亡歿後唱衣歷」、伯三八五〇號「唱衣歷」，又伯二六三八號「清泰三年河西都統算會賬」云：「已年官施衣物，唱得布貳仟叁佰貳拾尺」，證以寺院分賣衣物制度，所謂「唱衣歷者，即唱賣衣物所得之賬單，所謂「僧政愿清唱緋綿綾被」者，實僧正號愿清者唱賣之衣物（任氏亦嘗疑愿清爲僧正之名）；既無所謂清唱，而唱亦與歌唱無涉。是一切推衍發明，皆不能成立矣。假使立說者能獲完善之目錄索引，得知伯三四一〇號諸卷子內容，必不致貿然立說，亦無俟張氏論文之糾誤。故知正論不立，則謬說滋生，實爲學術之浪費。夫處今日宇宙之廣，學術之蕃，著述之富，豈一人之力所能勝？惟有融衆智於一爐，導萬途於一軌，然後能開闢蹊徑，窮極奧窔，博觀廣覽，取精用弘。而操其關鍵者，固有待完善之治學工具，然則目錄索引之作，曷可忽乎？今因士元之作，輒抒所懷，拉雜書之，以報其請。吾知志學之士，必愛重其書，陳諸几案，將以探檢舊聞，增益新作，其於斯學之發揚光大，詎云小補？士元靖獻學術之心志爲不唐捐矣！

己未八月廿七日潘重規序於九龍美孚新村寓居

近百年敦煌學的回顧

自一八九九年初夏，在我國西北地區敦煌千佛洞的藏經洞，發現了大量六朝隋唐寫本藏經以來，至今已屆八十多年的歷史，在這近百年內，中外學人利用新發現的敦煌寫本材料作為研究學術如經、史、文學、宗教、社會經濟、文物藝術等甚多，且漸漸成為今日中外學術界所重視的一種學術潮流。或更有以搜集中外學者在近百年內，對於敦煌資料發現經過，收藏情形、整理與研究等，加以系統的記載，因此「敦煌學」這門學問便成為世界學壇上唯一最受重視的學問。然而，究竟自敦煌資料發現以來，對此門學問加以系統報導的有多少？據初步的統計，如一九三〇年，我國學者王國維先生曾講述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現。由方莊猷先生筆記，刊登於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期。

一九四一年，向達先生著有敦煌學導論，刊登於圖書季刊新三卷一、二期。

一九四三年，傅芸子著有三十年中國之敦煌學一文，發表於中亞細亞二卷四期。

一九五三年，方豪先生著有敦煌學發凡，刊登於邊疆文化論集第三期。與敦煌學簡說。中國一周，一八一期。而在同年日人神田喜一郎在龍谷史壇卷三八發表了敦煌學五十年初編。

至一九五六年，神田喜一郎繼而發表其敦煌學五十年續編。到一九七一年，由二玄社合集出版成為單行本。其次如：

一九五六年，姜亮夫著有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一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是把有關敦煌石窟藝術寶庫及秘藏的古代文書經卷的重要內容作一簡介。

一九五八年，蘇登輝先生在中日文化論集續編刊登了敦煌學在日本一文。

一九六四年的六至九月份內，先生又在中美月刊內，連續發表了談敦煌學的文章。同年由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出版了敦煌學概要單行本，專文報導有關中外學人研究敦煌學的概況。此外如李濟先生的敦煌學今昔（自由談六期）潘重規有敦煌學發刊辭（戴密微先生八秩大慶祝壽專號），及日人長廣敏雄的敦煌單行本（東京平凡社）。藤枝晃有敦煌學之展開（歷史教學十卷五期）及現階段的敦煌學等，先後對於中外學人有關敦煌學術研究概況加以系統的報導。

至於專門搜集利用敦煌發現藏經寫本資料的學術研究論文目錄，更應是今日研究敦煌學術的最需要工具書籍。使能掌握此類工具書的運用，學者可以迅速知到前人研究有關該問題的成績與所需資料。一九五九年，日本東洋文庫，敦煌文獻研究連絡委員會，刊印了敦煌文獻研究論文目錄一書。此目錄收集有關日人研究敦煌學論文的題目，包括作者、譯者、出版書局及刊物與年份等，書日內收錄的論文至一九五八年為止。凡有關書籍或論文題目共九百七十六篇。大體上是日人研究敦煌學的一部總結式目錄。不過此書內容除了敦煌地區以外，還包括中國其他西北地區的考古論文題目在內。實則專門研究有關敦煌學的論文篇目，僅三數百條而已。且其分類亦頗為疏略。一個篇目索引最需要具備如搜集豐富與分類細密的條件，似未能做到。筆者在一九七一年，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論文目錄索引一書出版後，計畫搜集有關隋唐史研究的論文與書目，在此過程中，我發覺到有關敦煌學的論文甚多，尤以中、日方面而言，僅就利用敦煌資料以研究隋唐歷史、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的論文，已有上千的數目。因此，我決計暫時放下隋唐史研究論文目錄索引編纂的計畫，而集中在敦煌學研究論文篇目方面的搜集。更由於我僅是個業餘的學術研究者，沒有很充份的時間放在研究工作方面。加以編纂這類的論文目錄索引。表面看來甚易，其實也不盡言，例如搜集時，一定要假以時日和參考大量有關的目錄、書籍與刊物，其次是論文

題目及書籍沒有提到敦煌地區的，而實在是與敦煌資料有關的。必需將該論文或書籍逐一看過，才能確定是否屬於敦煌學範圍的論文，然後才能決定分到那一類，那一目。因此，時間一拖便是八、九年，今夏承假期之便，總算把這部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編纂成了。收集內容，包括中外學者有關敦煌學研究的論文書籍目錄，到一九八四年冬為止。凡六千零多篇，其中尤以中日學者著作佔絕大多數，在分類編排方面：大體上分為十四類、一百八十四目。

上述內容，可算是包括近百年來，中外學者研究敦煌學的方向與趨勢。而興趣專長方面，亦各有獨到之處，例如中國學者較為喜歡研究的，未必是日人所專長。國人較重視的，也未必是西方學者研究的對象。而在時間方面，較早時期與近世的敦煌學者，其研究風氣亦各有偏重。且其中有關資料對於解決歷史疑案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現略舉數例以見一般：

(一)政治經濟方面：

唐初玄武門之變，太子建成及四子元吉被殺，高祖內禪，而屯守玄武門的既是建成部下常何負責，何以李世民得反敗為勝？此唐史上的疑題，過去學者皆未能詳細解釋。法國巴黎圖書館藏有敦煌寫本，伯希和編號二六四零的常何墓碑，有李義府撰寫的常何墓誌銘，根據內文所錄，乃知當時建成與世民、元吉等，均曾以厚利收買敵對的人材勇將，常何曾隸建成舊部，而被世民所利誘。唐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門事變時，常何任屯守玄武門之職，太子建成、元吉被殺後，常何遂統率北門禁軍。其後更官至中郎將之職。使此役的真相更明確。武聖自高宗顯慶五年以後，大權實已在握，其所以遲遲未敢稱帝的原因與最大障礙者，莫如中國傳統上，對於女流之輩而稱專道寡的，實屬空前未見之事。如欲證明其特殊地位的合理，決不能於儒家方面經典求之，因儒家論政素來反對女流干政的，故武聖的欲革唐為周，非要假託佛教符讖不可。沙洲文錄補遺所載之敦煌石室文書，其中有大雲經殘

卷，王國維先生曾爲之題跋與考證（詳觀堂集林卷廿一唐寫本大雲經疏跋），乃知武曌篡唐所以據爲藉口的真相，頗與新莽時，遭五威將軍王奇等十二人誅符命四十二篇的事蹟與政治作用相似。而此段歷史的真相亦更明確。

社會經濟方面。利用敦煌資料作此類研究的，例如河西社會經濟方面而言，勞幹先生曾於一九四四年在史語所集刊十一卷發表有關漢簡中的河西經濟生活一文。楊聯陞在一九五〇年的國學季刊。沈元在一九六二年的考古。韓國磐在一九六二年的歷史研究。王永興在一九五七年的歷史研究等刊物，先後有專文發表。而較有實用意義的，是從敦煌所藏文書中，發現自晉代至趙宋間的戶籍殘簡，而倫敦英國博物院所藏的西涼建初十二年籍，和唐大曆四年籍，經由日本濱田博士發表於東洋學報第四卷。此外又有唐先天二年籍。大曆四年籍。大順二年籍。宋雍熙二年籍。至道元年籍，及部份年月不詳的戶籍，羅振玉多據狩野博士所錄，收在沙洲文錄補遺內刊行面世。至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書中，曾由日本羽田博士攝出部份唐代戶籍殘簡，亦即伯希和收集品二五九二編號，有關敦煌郡，敦煌縣龍勒鄉，都鄉里天寶六載籍。其後日人玉井是博著敦煌戶籍殘簡考，已把全文刊錄，根據這些記載，大抵頗能幫助了解唐宋時代土地制度與實施情況。尤其是在唐高祖武德七年以來推行的均田法。例如應該規定在令中的田令等問題，每因年代久遠資料不傳，過去學者除依據唐六典，通典、唐會要。新、舊書食貨志等記載以外，別無他法。對均田法的規定，亦不大清楚。或有互相參錯的地方很多。但唐代敦煌戶籍的受田數，是根據當時均田法的規定來計算的。所以只有與這些實際計算一致的記載，才是正確流傳下來的資料。故在唐代敦煌戶籍殘簡發現以後，才能確證前人論說的是非，同時對於唐六典記載不詳確的地方，亦能加以糾正。至於唐代均田法在當時究竟實行到甚麼程度？根據戶籍殘簡如天寶六載籍。大曆四年籍及部份年月不詳籍來看：發覺受田人應受的田數，完全沒

有依照田令規定的數目授與。其中較多的，不過授與一部份而已。亦不是按照一定的比率授與。例如永業田及園宅地，雖則其田額屬較少數，而某戶固照規定授與，但某戶則僅授給一部份。又如授與勳官的永業田（勳田）亦見僅給一部份的例子，而多數完全未曾授與。因此不難明白到，租庸調稅法下的農民生活是如何艱苦？也是不能不被兩稅法替代的原因。而唐代均田廢止的時間，雖無明文紀錄，但因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〇）制定的兩稅法，在原則上與均田制下的租庸調法不同，而藉着這些敦煌戶籍殘簡亦至少可以看出均田法在此時已完全廢止。例如大順三年（公元八九二）的戶籍便已經不再紀錄應受田的數字。一九三六年，我國學者陶希聖先生，把中日之專籍雜誌中有關敦煌戶籍丁籍資料收羅在一起，編成唐代戶籍簿叢輯，發表於先生創辦的食貨半月刊特輯。這些資料對研究我國社會經濟，尤以唐代方面，更具價值，陶先生在其小序裏說：「即如我們研究唐代的均田制度，單看均田令是不行的……只有查看戶籍才可以明白。又如唐代的兵及兵官，是以一定的資與一定的產為標準徵募的，我們看到戶籍記錄每丁的下面註明他的資，又把丁分別記在「中下戶」或「上下戶」之下。特定的丁，對政府負擔特定的役，如渠頭里正、村正、堡主之類。特定的丁對於政府有特殊的關係，如捉錢，侍丁之免兵役、終服之復兵役，這些都是有興趣的記錄。」而且更是研究唐代社會經濟的重要資料。日儒對此方面的研究頗有成就的，除上述的濱田耕作、狩野博士、羽田亨、玉井是博之外，他如仁田田陞、那波利貞、山本達郎、石田幹之助、曾我部雄、西川元祐等，亦是專門研究此方面而較有成績的學者，但六〇年代以後，日人利用敦煌資料研究我國社會經濟風氣，根據著作目錄的顯示，已大不如前。

（二）宗教思想方面：

利用敦煌資料以研究宗教思想的，要推佛學方面為多，而佛教史的探求，在過去幾十年來根據著作目錄的顯示，幾為日本學

者所獨佔。至於佛教經典的考釋，我國學者如王國維雖曾著有唐寫本大雲經疏跋。晉開運刻昆沙門天王象跋。摩訶般若波羅密經殘書跋等論著。陳寅恪先生則著有斯坦因 Khara Khoto 所獲西夏大般若經考。敦煌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本義跋。蓮花色及出家因緣跋。敦煌本心經王授陀經及法句經跋尾等。周淑迦則撰有敦煌本大方等大集賢護法經卷第一疏跋及敦煌寫本菩薩律儀二十頌跋等。皆有所闡發，至於周一良、向達、呂澂、花菴、蘇瑩輝、陳祚龍、吳其昱、冉雲華等，亦頗有涉及此方面的研究。但較諸日人在此方面的成績而論，深度與數量皆勝於中西學者。日本早期研究佛學較著的有松本文三郎，他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間，曾撰有異本般若經に就いて。敦煌本大雲經ト賢愚經。佛典の研究。六祖壇經的書誌學的研究，佛教史雜誌等頗有份量的文章。其次推井上以智爲先生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間，先後撰有唐代に於ける五臺山の佛教等の著作。至於矢吹慶輝氏在佛學方面的研究，不獨是中外佛學的大宗師。其在三階教方面的研究成績更是肯定的。其他著作更有敦煌出土疑偽古佛典に就いて。敦煌新出觀無量壽經古逸疏。敦煌出土古寫佛典に就いて。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に就いて。敦煌新出土稀觀古寫本に就いて。神尾氏の觀心論私考後記。支那佛教史と現存偽錄等。而較爲後輩的道端良秀，關口慈光，土橋秀高、牧田諦亮等不下數十人之多。但就日本有關佛學研究的風氣來說，大抵由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間爲全盛時期。自一九四〇年至六〇年間，爲次盛時期。一九六〇年到目前爲止，日人利用敦煌資料研究佛學的風氣已大減。比觀中國方面，除早期王國維略有題跋（見錄於觀堂集林）之外。其他較有成績的如陳寅恪、向達、周淑迦、董作賓等。大抵在一九四〇年至六〇年間撰作爲多，稍後的如呂澂、周一良對佛學研究雖頗有創獲，但畢竟在低潮時期。又因敦煌地居我國西北部，接受印西佛學及其思想，當較內地爲早，而鄰近地區的于闐、吐魯番、龜茲、高昌、回鶻及西夏方面的佛教研究，亦屬有關連

與必要，我國學者如王國維、子龍等，對此類研究雖略有涉及，但總不如日人的專且精，早期學者如羽溪了諦堪推大家，他在一九一一年至三七年間，先後撰有龜茲國の佛教。于填國與佛教。西域の佛教。阿富汗に就ける佛教遺跡。中亞佛教の特徴。中亞佛教的思想與特徵。中亞佛教教會の特異相等多篇論文。其他如石濱純太郎、羽田亨等，前者著有于闐出土梵本法華經考。于闐文智矩陀羅尼經の斷片。西夏語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可思議說明。回鶻之白傘蓋陀羅尼經的斷片。回鶻文普賢行願品殘卷等。後者亦先後於一九一三年至二六年間，尤其對回鶻佛教史作專門研究的，有回鶻文の天地八陽神咒經。回鶻文法華經晉門品斷片。回鶻文的佛典について。回鶻譯文安慧の俱舍論實疏等，均可看到羽田先生在此方面的造詣。但自一九五〇年以後，日人對這類問題的研究已甚少見。較諸中國方面，益見後繼乏人了。

至於淨土教方面，日本學者仍推矢吹慶輝氏爲大家，先生曾著有敦煌出讀阿彌陀佛偶並に略論安樂淨土義に就て。及敦煌淨土教研究資料こ就イテ等論著。較後起的，要推小笠原宣秀，他對中國淨土教家の研究與吐魯蕃淨土教の一斷片等頗有研究。其他如石濱純太郎、塚本善隆、望月信亨、本田義英、河原由雄等，自一九二七至六八年間，先後均有著作發表，而中國在此方面有研究心得的，尚屬少見。至於利用敦煌資料研究三階教的學者，就以中國本身而論，亦很少談及，即使皈依佛門的也未必知道。其實三階教曾在隋唐民間流行數百年之久，湯用彤先生著魏漢南北朝佛教史（下冊二〇九頁）雖頗有提及，但語焉不詳。由於此教派在當時與流行於民間的佛教主流淨土宗彼此不能相容。故在隋唐時曾多次受到傳教與各種的排斥。但三階教畢竟在中國佛教史上佔重要的一葉。日人矢吹慶輝著三階教の研究。其自序說：「三階教是：大乘佛教之一歸趨，佛教各派之一異彩，日本新興諸宗之前鋒，隋唐思想史上之一系」。計自先生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先後發表有關三階教の普法に就いて。三階教

の研究（單行本）。三階教に於ける全佛教の改造運動その經濟思想，三階教研究をめぐりそ等の名著，他如神田喜一郎、高雄義堅、塚本善隆、大野法道、道端良秀、大谷勝真、兼子秀利等，均曾撰文研究三階教。

對於隋唐時代中國佛學四大教派的天臺、華嚴宗的研究，中西學者對此未見重視。日人利用敦煌資料以探討問題的如本田義英、關口慈光、關口眞大，及渡邊海旭、林有海、眞田有美、坂輪宣敬等，曾有若干的研究。法相宗方面如諏訪義讓、結成令聞、芳村修基、福原亮嚴等，大抵在一九三〇年至六三年間，頗有研究心得發表。近十多年來，研究風氣已稍減。禪宗則是中國化佛教的最大宗派，我國專門研究禪宗的學者不少，但利用敦煌資料而有所創獲的，僅推胡適、周一良等三數人而已。日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更多，大師尚屬不少。如鈴木大拙的六祖法寶壇經につきて。神會和尚の壇經と考ふべき敦煌出土本につきて。六祖壇經に關するソテの意見。達摩觀心論四本對本。龍谷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敦煌本菩提達摩觀門法大乘法論殊に其中的の修身要論に就きて。敦煌出土達摩和尚絕觀論につきて等，對這方面的研究可算成爲專家之學。其次如關口眞大，對於敦煌本達摩大師四行論について。與達摩和尚絕觀論は中頭法融の撰述たるを論ず。及新資料達摩禪師論。敦煌出土について等の研究，成績不下於鈴木先生。至於鈴木貞太郎、岩井大慧、松本文三郎、久野芳隆、中川孝、關口慈光、田中良昭等，亦有相當的研究。但自一九六八年以後，日人對禪宗方面的著作，頗有明日黃花之感。

我國研究道教的專門著作不多，利用敦煌資料有所創獲的更少。雖則遠者如羅振玉、王國維，近者如陳國符、劉誠等，對道藏方面的研究頗有著述。一般而論，較日人研究的成績尚差，日人如吉岡義豐、矢吹慶輝、望月信享等，對此方面的研究皆有所創獲。

景教是一種外來宗教，在唐代已見流行，我國學者陳垣先生

對此方面頗有權威的著作如火祇入中國考等。其次如較晚的梁子涵先生，對於唐代景教文獻及譯經方面的研究，較之日人羽田亨、佐伯好郎殊不遜色。羽田先生曾著有敦煌發現の景教經典一神論の解説，與景教經典志玄安樂教に就いて。新出波斯教殘經考釋，景教經典序聽述詩所經に就いて。大秦景教火聖通真歸法讚及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の解説等。而佐伯好郎先生則對於景教歷史の研究。景教研究の歴史と現状。支那基督教の研究，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及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殘卷について。與中國に於ける景教衰亡の歴史等。可見其大概，但中日學者對此方面的研究，一九六〇年後，亦漸見式微。

中國學人早期對於摩尼教的研究，如羅振玉、陳垣等已有很好的成績，前者對敦煌本摩尼經的校錄頗具成績，而後者所著摩尼教入中國考，作更深入而有系統的研究，日人對此方面的研究，仍推羽田亨，矢吹慶輝為最，羽田先生於一九二三年對摩尼經典遺文方面曾有論著，而矢吹先生則於一九三五至四零年間，先後發表了佛教と上摩尼教與胡化經中の摩尼教等論著。然大體上，在此方面較有成績的，仍推陳垣先生為最。

（三）學術文化方面：

經學向為我國文化學術的主流，而版本異同，亦為治經者最大的困難，唐以後的經籍流傳與版本異同，或展轉偽誤的不少。自敦煌寫卷的出現，學者與藉此作為校勘原本而獲益的很多。先就詩經而論，我國早期學者如羅振玉，及日人狩野直喜等，對敦煌出土毛詩殘卷多有題跋校勘工作。羅著多收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與遼居雜著之內。狩野先生與內野熊一郎則先後在漢文學會與史林刊物曾發表論著。較後的如港臺方面的潘師石禪，尤其對敦煌毛詩殘卷作有系統而深入的校錄研究，先生在一九六八至七一年間，先後在新亞學報，華岡學報及羅香林祝壽論文集發表論著多篇，無論質量方面，大大超出前人的成績。

書經方面，雖則羅振玉、劉師培、王重民、潘重規等皆有研究專著發表，但仍以龔道耕、陳鐵凡二先生更為專長，龔氏於一九三六年至四一年間在華西學報先後刊出其著作唐寫殘本尚書釋文考等。陳氏則於一九六一至六九年間，分別在大陸雜誌、南洋大學中文學報、新社學報等，發表論文多篇，對尚書的斟證補遺貢獻不少。而日人對敦煌本尚書殘卷的研究亦頗多，早期學者如狩野直熹，亦曾在一九二二年支那學刊發表了舜典十二寫秋文答問。一九一五年在藝文刊出的有唐鈔古本尚書釋文考等論著。內野熊一郎則對敦煌本尚書釋文殘卷の研究等，曾刊在中國文化研究會報內，亦不失為有份量的研究。

禮記的研究，中外學者較少用力，獨羅振玉對敦煌本禮記檀弓殘卷跋，曾加以考證，見收於雪堂校刊羣書敍錄。而羅振玉、王國維亦對敦煌本春秋經傳有所題跋研究。前者如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雪堂校刊羣書敍錄收）。後者則有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觀堂集林卷廿一收錄）。而劉師培有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收錄有左傳杜預集解昭公殘卷跋與左傳杜預集解定公殘卷等曾作題跋考證。近人陳鐵凡亦曾在大陸雜誌四十一卷七期刊出左傳節本考一文，其他利用敦煌資料研究左傳的不多。至於日人林秀一，則獨對孝經研究頗見深入，先生在一九三五年至六〇年間，前後在漢學雜誌、書刊、岡山大學學術紀要及東方學等發表其論著，堪推專家之學。但臺灣方面的蘇瑩輝先生對於孝經論著亦不少，如敦煌北魏寫本孝經殘葉補校記。敦煌新出北魏寫本毛詩孝經合考。從敦煌北魏寫本論語序真偽及孝經要義等。其次推陳鐵凡先生無論於書、春秋、左傳、穀梁方面皆有研究，尤對論語的著作特多，例如一九六〇年大陸雜誌刊出的敦煌論語三本疏證。六一年發表的敦煌本論語異文彙。又在孔孟學報發表有關敦煌論語影本敍錄。六三年復在冊府刊出論語敦煌本的學術價值一文，都是很有價值的著作。近年大陸吐魯番盤地出土的唐寫本論語對經學的校勘研究又增添了不少材料。例如文物出版社發行的一九七

二年文物二期曾刊出晉寫本論語鄭注說明一文。文物五期有韓國磐的卜天壽論語鄭注寫本和唐代的書法。與中共科學院考古研究室出版的考古，亦先後在一九七二年的一、二、六期，刊出郭鼎堂先生的卜天壽論語後的詩詞雜誌。科學院考古資料室的唐景龍四年寫本論語鄭氏注殘卷說明。唐景龍四年寫本論語鄭氏注校勘記。及龍晦先生撰寫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與卜天壽論語寫本等文章。對敦煌學的研究又興起一個小浪潮，反觀日本及西方利用敦煌資料研究經學的已不多見。

次論敦煌資料對詞曲的研究，其重要性不下於變文方面，尤其對於詞的起源的爭論，却由於敦煌曲詞寫卷的出現而解決了過去文學史上未能解決的疑題，雖則詞在唐代並非文學的主流。但推尋其起源，則又可當別論，近世學人力主詞起於晚唐的很多，其中頗以胡適先生的立論較為有力，影響亦較大，先生在詞的起源一文（胡適文存卷七收錄）力主起於晚唐之說，更否定了崔令欽教坊記附錄的曲名表三二四調內，有菩薩蠻一調的可能性，認為「教坊記中的曲名表，我却不能認為原書的原文，不能認為開元教坊記的曲目。我疑心此表經後人隨時添入新調，此種表只供人參考，以多為貴……所以教坊記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來考證盛唐教坊有無某種曲調」。但是近數十年來，由於敦煌曲詞的發現，詞起於晚唐之說不攻自破。筆者嘗著菩薩蠻憶秦娥創調考一文，一九六五年七月，刊登於現代雜誌一卷六期，曾引用敦煌曲子詞資料，力證詞的起源應在盛唐。其後胡先生曾撰文提及詞的起源問題時，承認早年未有注意佛曲與詞體演進的關係而間接修改了前說。至於對敦煌曲子詞編錄並加以校勘整理而頗有成績的，任二北先生有兩部重要的著作，一為敦煌曲初探，一九五四年十月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另一為敦煌曲校錄不分卷，一九五五年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是書收入中國戲曲理論叢書內。他如唐圭璋有雲謠集雜曲子校釋。王重民有敦煌曲子詞集三卷，附錄二卷。及蘇堂輝、饒宗頤等對敦煌曲子詞皆有研究貢獻

。日人對敦煌曲子詞的研究不多，雖則入矢高義等亦有敦煌定格聯章曲子詞補錄的研究，但遠不如中國學者在這方面的成就。

敦煌資料對研究中國文學方面的貢獻，而又最有價值的，當推俗文學方面，所謂俗文學，其形式多與後世彈詞相類似，是一種有說有唱的文學作品，內容多數取材於佛經和民間傳說，或野史的故事。近世學者又因這些作品裏，有八相變、目蓮變等保持在原卷之中，於是把這類作品泛稱為變文。變文究竟起於何時？關於這個問題，向達先生曾在一九三七年人海燈雜誌發表了變文的產生說到佛教文學在社會上的地位。鄭振鐸在一九三五年著有什麼叫做變文和後來的寶卷諸官話、彈詞等文體的關係怎樣等的文章，大體上已有所交待。至於我國學人對變文研究已特具成績的，除上述二人外，無論質量方面，當推王重民、周紹良為大家。王氏對敦煌學的貢獻如目錄、校勘方面不在話下，對於王陵變文、薰永變文、季布變文等研究尤具深度，一九五七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有敦煌變文集八卷，內附曾毅公的敦煌變文目錄的一書面世（一九六四年九月，臺灣世界書局有景印本，改名為敦煌變文），王氏對此書出版的目的有三。首先他把握敦煌所出變文和變文有關資料，彙錄校勘。編成一本較完備的彙編本，以供研究和閱讀古典文學者的使用。其次是從校印本內選出最優秀的作品，加以簡明的注解，藉供一般讀者使用。其三是將可能找到原卷或照片，用珂羅版景印以保持原形，供專門研究者的使用。而周紹良先生更早於一九五四年在上海出版公司排印刊出其敦煌變文彙錄一書，一九五五年曾加以修訂，著作重點是將分散在國內外公私收藏的唐寫本變文彙輯而成書。修訂後，後加上向未外傳的孟姜女變文，並將原書殘缺首段的王陵變文補全。其他也根據完整的寫本補正了許多脫誤文字。故周、王二書面世後，對研究俗文學增加了許多方便。其他如孫楷第、趙景深、傅芸子、劉修業、徐震堦、關德棟、譚正壁、羅宗濤、邵紅等，對變文的研究，並皆有著述。但日人如那波利貞、秋山如光、金岡照